

社会图像丛书

秦红增◎著

乡土变迁与重塑

——文化农民与民族地区和谐乡村建设研究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社会图像丛书

乡土变迁与重塑

——文化农民与民族地区和谐乡村建设研究

秦红增 著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年·北京

序：人类学、乡村社会及人类未来

周大鸣

一、人类学与中国乡村社会认知

万物皆理。认识世界、为人所悟是所有学科的共同目标，人类学也不例外。但是在“如何”这两个字眼上，则各有千秋。以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为例，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耕作历史的文明古国，万年以前，就有了定居村落的雏形；耕作文化肇始于春秋，定型于两汉，及至唐宋，即至顶点。与此相匹配，则有乡规民约、门第观念、纲常道德。两者一起构成了源远流长的中华“精耕细作”文明。其一开始，便伴随帝国的“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而传遍四海。故乡村社会、乡土研究便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一项基点，加之民族、异文化视角，人类学在这方面的研究更有独到之处。

美国人葛学溥(D.H.Kulp)是最早以田野工作方法对中国乡村社区进行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他于1918~1923年在中国华南沿海地区一个名叫凤凰村的地方，进行了人类学、社会学调查，并于1925年出版了《华南农村生活》一书。该书详细地记录了凤凰村的经济、家庭、宗教、教育、人口及社区组织的情况。及至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乡村社区研究即蓬勃开展起来，涉及整

个中国,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著作,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翼》,杨懋春的《一个中国的村庄:山东台头》等,以及后来许烺光的《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抗战时期费孝通、张之毅在云南大学“魁阁”写下的《云南三村》,田汝康《芒市边民的摆》等。

更值得一讲的是中国少数民族研究,如容肇祖、杨成志、颜复礼、商承祖等人的云南、广西调查,林惠祥的台湾高山族调查,凌纯声的东北满一通古斯语民族调查,等等。历史上,经历代王朝的“教化”,及游牧民族的不断南侵,农耕文化早已传播四海,即便生产与生活方式各地有异,风俗习惯也各有特质,但是基本的纲常伦理则相差无几。因此,尽管有农耕、游牧、山地、疍家等族群之分,我仍以为大多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应构成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一部分。

所有这些 20 世纪前半期人类学或民族学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试图从村庄研究来呈现中国社会的整体面貌,并寻找社会学与人类学在社区研究中的方法论结合,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承认,为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础与研究范式,直到今天依然散发出学术的光芒。

20 世纪上半期对中国农村的研究中,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所做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也值得一提。虽然这一调查的目的是为日本的殖民地统治服务,但是,它所积累的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有着珍贵的学术价值,为以后学术界对中国村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材料。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社会学、人类学在中国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学科而被迫取消,原先从事村落

研究的学者转向对中国少数民族的调查。除个别情况外,从事中国农村研究的学者不再有进入村庄——特别是汉族村庄进行田野工作的机会和条件。在随后的30年里,国外学者也几乎完全失去了在中国大陆从事田野调查的机会,一些从事“汉学”研究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便以台、港地区甚至新加坡的华人社区为观察点,或者依据以前的调查资料来继续研究中国农村社会。这一时期主要的学术成果如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1890~1949年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陈佩华、赵文词、安戈《陈村:毛泽东时代一个中国农村社区的近代历史》,赵文词《一个中国村庄的道德与权力》等。这些著作对后来中国学术界关于乡村社会研究的影响较大,但其所形成的一些学术范式,又使得一些“对话”或“对接”式的研究过于讲究乡村社会的结构,以致没能充分关注现时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巨大变迁。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人类学学科恢复建设,学术禁锢被打破,学者们开始对乡村社会进行追踪性调查研究,比如费孝通等人的江村重访,庄孔韶的“银翅”,笔者的“凤凰村追踪”,麻国庆的“家”,孙庆忠的“今日南景”,兰林友的“后夏寨村”,潘守永的“重访台头”,段伟菊的“云南西镇”,阮云星的“福建义序”,等等。这些研究涉及中国乡村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生产、生育、生活、制度、组织、信仰等,不只是认知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与发展,而且延续了人类学学科的范式与精神,积累了丰富的乡村社会研究经验,为后来从事乡村社会研究提供了宝贵借鉴。

但是,中国人类学有着很强的应用性格。无论是其承继于中

中国传统儒家学说中的“经世致用”精神，还是得因于人类学传入中国社会时，恰逢中国“乱世”，列强横行，国家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救亡图存、民族振兴因而成为首要任务。这一精神，时至今日，仍是中国人类学学科的基本精神之一。换言之，学术再怎么独立，但是“经世致用”的精神不能丢。因此，伴随中国的改革开放，人类学的研究涉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都市变迁，文化保护与传承、创新，民族旅游，社会保障，弱势关怀。这里重点讲乡村建设。

二、人类学与中国乡村社会建设

中国自古以来便以农立国，农村经济的好坏对整个国民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所以历朝历代都比较重视发展农业，注重对农业生产技术的经验总结及对农民的生计教育。比如西汉晚期氾胜之《氾胜之书》、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元王祜《王祜农书》、明徐光启《农政全书》等。再如战国时期《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农学著作，反映了中国精耕细作农业传统的发端；《管子·地员》论述了土壤和植物的关系，都有较大的实用价值。但鸦片战争后，政府及有识之士多把发展的注意力放在工业及制度、精神的文明上，以致无暇顾及农业。然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在严重衰退的同时，也加剧了城市商业和工业的萧条，从而激起人们研究农业的兴趣，比如著名的民国乡村建设派等。再后来，50~80年代，土地改革、人民公社运动，虽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基础，但根本问题如贫困、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仍然没能很好地解决。

家庭联产责任制及后来的土地承包制，虽在初始激活了乡村，

但小农式的生产经营与全球化的工业化制度很不匹配,再加上区域发展的不均衡,城市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导致农村发展的劳动力危机,及至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再一次把中国乡村社会建设摆在人们的面前,中国政府也适时地提出了新农村建设、和谐乡村建设等基本国策。这方面,我所做的工作除了乡村都市化研究外,重点还有中国乡村的内源式或参与式发展,这可说是我把人类学学科致力于应用的最重要地方。

围绕发展中国家如何选择制度模式,早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有过“外源式”和“内源式”的争论。最典型的是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计划(1961~1970),意在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实现社会和制度转型,从外部输入制度、文化、技术、思想方法、组织体制、行为方式等发展模式,可是,发展中国家总体经济状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趋于恶化。这个计划的失败,深刻教育了联合国的官员们,由此提出了“内源式”发展的新思路,其核心是否定物质因素在发展观中的主导地位,强调以人为中心。由于发展是以人、人的能力和人的创造性为中心,因此社会—文化因素被认为既是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又是发展的最终结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发展就是转化成为文化的科学(技术、经济、环境等等,总之是人类的一切活动)”。实际上这就是“以人为中心的内源发展”。

这一发展理论认为,当社会变迁由一个社会内部的发明创造引发时,就属于内发发展;由外部的传播引发时,则属于外发发展。就中国乡村发展而言,内源式发展即是农民再造乡村的过程,其原因有:首先,内发发展首先是精神价值得以实现的过程,只有民意得到充分反映,村民主体性得到充分发挥,才能依靠自身力量,找到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以及实现途径;其次,从村落与外部环境

的相互关系看,内发发展意味着从地区的文化传统出发,适应固有的自然生态环境,自立地发展。自立性是内发发展的突出特征,这种发展将创造出地区经济自我循环机制,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与经济基础;第三,把发展看作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赋权”过程,不仅重视当地人的参与,强调向当地人学习,而且创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工具来增加社区和弱势群体(贫困人群和妇女)在发展活动中的发言权和决策权,从而尽可能地扩大当地人在发展中的参与性、主动性和创造力。多年来,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组织在中国所资助的农业项目、林业项目、环保项目、社区综合发展项目等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我以为,除了经济社会效益效应外,更重要的是将新的发展理念引入了中国。目前,参与式发展项目的领域逐步扩大,从农业、林业发展到农村能源、卫生保健、妇女、供水、教育等领域,从纯粹的自然保护拓展到生产和保护相结合,从单目标扩展到综合发展,从农村发展项目向小城镇发展项目扩展,从而为农民再造乡村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机制。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秦红增这部著作,即是新的发展理念的实践解读与扩展。在书中,作者提出了“文化农民”的概念,我以为比较妥当。大家都知道,传统社会里面,士农工商,以农为本,但是近代工业社会以来,农村、农民、农业则成了“落后、保守、陈旧”的代名词,到今天依然如此。但实际上,农村、农民、农业已不再是明日黄花,而是生机勃勃,情趣盎然;不只是社会的根本,而且在生活方式和文化精神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参照,一个灵魂的恬淡场景。

关于时下中国乡村建设,相信读者通过本书可得到更多的感悟或认知。我只想再次肯定的是农民的现代定位。因为乡村建设

在于再造农民还是农民再造，这里面实质上包含着对农民角色的定位问题。当把农民定位为落后、保守的话，那么农民只能处在被改造的地位；反之，当把农民定位在拥有特定乡土知识和现代技能，有着自我发展能力的话，农民自然就成为乡村的再造者。对于后者，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称谓，如精英农民、创新农民、现代农民、“先锋”农民等，秦红增将其称为“文化农民”，意在从文化自觉层面对农民这一长时期被当作“改造对象”的肯定，体现了人类学的“主位”研究原则。正如作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当地人在谈到村里某人是个“人物”时，便说这个人是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而那些没有本事、不是“人物”的人则没有文化，没有知识；这高度概括了农民在乡村发展中表现出的文化自觉性，他们能够将发展干预与自身的条件有机结合，无论是接受现代科技知识和技能，还是参与项目、外出打工，都有自己的决断力、创新性。

总结起来，目前在中国乡村社会中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如农业产业化、村民自治、文明社区建设，需要的是每个农民的自觉。我们可以通过培植乡村精英来带动，但只有每个农民都转变过来，才可实现这些目标。若不然，精英阶层就会成为乡村社会的实际操纵者，所形成的精英特权反过来会危及乡村的民主和发展进程。

另外，本书是建立在扎实的田野调查与成熟的理论思考基础上的。从2002年至今，秦红增就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及民族地区乡村建设问题，进行了多年的思考与田野调查。他的调查点不仅包括中国广西、云南等西部边疆民族地区，还有中国台湾、孟加拉国等地的乡村发展个案研究，成果具有持续时间长、田野点多、个案资料丰富等特点。由此来看，本书无论是对人类学的学科发展，还是对中国乡村社会建设，从点到面都有着借鉴意义。

三、人类学与人类未来

屈指算来,人类学传入中国已百年有余。但这个学科从诞生之日起,就被赋予了重要的“关怀”责任,“自我”与“他者”,西方与非西方,传统与现代,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当下,更是承载着保护与传承人类多样性的重任。

前面说过,中国乡村社会及农耕文明,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根本,与之相呼应的乡土、乡情、乡恋、乡愁,乃是当代中国人与生俱来的东西。当我们厌倦了城市生活时,当我们感觉到食品安全受到威胁时,当我们高兴或悲伤时,当我们的灵魂需要净化时,我们都愿意走向乡村,毫无顾虑甚至有些贪婪地享受缕缕清新的乡土气息、恬静安逸的文化景致。正是基于此,新的乡村建设不能不谈及文化,不能不以保护与传承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为目标。因此,尽管在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浪潮席卷而来的情势之下,乡村未来似乎也难以摆脱“被全球化”、“被城市化”的命运;尽管在时下中国,对土地、矿山、森林等资源的争夺,已使许多农民成为失地农民,也迫使这部分人不得不“市民化”,但我们需要的是文化多样,而不是文化单一的乡村和谐;需要的是合理地将现代与传统、都市与田野、全球与地方等有机相合,从而塑造出独特、多样且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型乡土文化,而不是单纯的“城市化”,让城市吞并农村;需要的是每个民族找到自己生存与发展的位置和贡献,而不是强势民族或国家的独裁与霸权。

这一点诚如秦红增在结尾所言:城市对乡村的需要,不仅是清新的空气、纯净的泉水、绿色的食品等物质需要,而且更重要的是

情感依赖和精神归宿,对于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农耕文化的国家,尤其如此。城市如果“消灭”了乡村,人们不仅难以享受到科技进步的成果,而且也同时丧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毋庸讳言,相对于汉民族,少数民族乡村的文化多样性表现更为突显。因此,我们在民族地区和谐乡村建设中,更不能简单地陷入先进与落后、中心与边缘等机械式的区分,而是应把少数民族乡村所承载的文化作为一面镜子,映射出城市文明的优势与不足,以期更好地为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秦红增作为我的博士生,与我相识十多年。多年来,他的研究都是围绕乡村建设这一话题展开,翔实的田野调查资料和丰富的理论积淀为这本书的完成打下坚实的基础。起初他对乡村社会的关注是2002年5月在皖南的时候,当时我们在做汤口到屯溪高速公路的社会评估,其间针对乡村社会这一话题,他与我进行过多次交流和讨论。他的博士论文《桂村科技:科技下乡中的乡村社会研究》(2004年)的完成,逐步厘清了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思路和方法,并将研究系统化。如今他能有这样的研究成果,对此我很欣慰。希望他在新的研究和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也希望中国人类学发展越来越好。

是为序。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与回顾	1
第二节 研究的理论关照与内容	7
第三节 研究方法 及田野工作概述	20
第二章 文化农民与民族地区和谐乡村建设	24
第一节 持续与和谐:参与式或内源式发展新思维	24
第二节 他者视野:孟加拉国、中国台湾等地的乡村建设	37
第三节 本土反思:文化农民与和谐乡村建设	51
第三章 文化农民的群体特征与生成机制	62
第一节 文化农民的群体特征:素养、知识与技能	62
第二节 现代农业技能习得与文化农民的生成	69
第三节 现代农业技能教育:地方性知识视角	86
第四节 农村妇女现代农业技能习得方式省思:东面村 过山瑶的例子	105
第四章 田园竞秀与诗意栖居	
——民族地区和谐乡村生态建设	112
第一节 田园家园同构:文化农民的和谐乡村生态观	112
第二节 家园生态建设之一:雨卜苗寨公共卫生	131

2 乡土变迁与重塑

第三节	家园生态建设之二:布努瑶、红瑶村寨 环境卫生比较·····	154
第五章	超越村落与村落重构 ——民族地区和谐乡村社会建设·····	179
第一节	超越村落:文化农民社会资本的扩展及其结构···	180
第二节	民族地区家庭养老土地支持方式·····	200
第三节	乡村生计转型视野下的返乡农民工再就业: 以石丰村壮族为例·····	218
第四节	民族地区留守儿童教育问题: 以石丰村为例·····	234
第五节	村落公共空间重构与社区认同: 濂浩屯壮族的例子·····	252
第六章	民族文化展演、重构与文化自觉 ——民族地区和谐乡村文化建设·····	266
第一节	民族文化展演的功能及意义·····	268
第二节	民族旅游与民族文化的再建构·····	282
第三节	族群文化标识与文化自觉·····	302
第七章	乡土知识、现代科技与乡村重塑 ——布努瑶族、壮族的例子·····	320
第一节	乡村社会的两类知识体系·····	320
第二节	现代科技、生计模式与乡村文化变迁: 布努瑶的例子·····	336
第三节	乡土知识、现代科技与新型农庄经济: 柳江成团壮族的例子·····	351

第八章 文化多样与民族地区的乡村和谐.....	369
第一节 研究的主要结论.....	369
第二节 民族地区和谐乡村建设中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研究 ...	371
第三节 文化多样与民族地区的乡村和谐.....	374
后记.....	378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与回顾

和谐乡村建设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构建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国家相关文件中就出现过这种提法,改革开放以来,在 1984 年中央 1 号文件、1987 年中央 5 号文件和 1991 年中央 21 号文件——即十三届八中全会《决定》中都反复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着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2005 年,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体要求。紧接着 2006 年中央 1 号文件再次将中国和谐乡村建设与发展问题摆到了突出位置。可以说,“1 号文件”既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吹响和谐乡村建设的集结号,也是对近百年来中国乡村建设所取得成果的凝聚。文件中所提出的新型农民、村庄规划、循环农业、“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乡用等新概念,对于时下的和谐乡村建设有着纲领性的指导意义,也从根本上刷新了此前的“三农”概念,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了实实在在的内容。与此相对应,关于和谐乡村建设的理论探

讨和实践探索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目前学术界的探讨来看,相关研究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对以往的和谐乡村建设进行反思。如对早期的主张教育农民的乡村建设派,以及后来规模宏大的改造农民运动等的研究。研究较为全面地总结了传统乡村建设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对教育农民、改造农民的传统做法进行了系统反思,批评了“工具论”式的乡村建设思维模式,为新的乡村发展理论的引入与实践提供了支持。^①

二是对内源式或参与式等新的乡村发展理论的探讨。新的乡村发展理论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由一些应用人类学家提出,并为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署等组织所倡导,目前已流行于世界各地。该理论起源于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反思,成长于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国际发展实践中,为解决农村发展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以来,首先由世界银行在农业、林业、环境保护等资助项目中引入中国,至今已扩展到农村能源、卫生保健、妇女、供水、教育等领域。已实施的项目有效地削减了农村贫困、民族地区发展缓慢等现象,在乡村发展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与此相配合,国内如李小云^②、叶敬忠^③、周大鸣^④等学者,在

① 秦红增:《农民再造与乡村发展:文化农民系列研究之一》,《广西民族研究》2005 年第 2 期。叶扬兵:《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 年第 1 期。

② 李小云:《参与式发展概论:理论·方法·工具》,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③ 叶敬忠:《创造变化的空间——农民发展创新的原动力研究》,《中国农村观察》2004 年。

④ 周大鸣、秦红增:《参与发展:当代人类学对“他者”的关怀》,《民族研究》2003 年第 5 期。周大鸣、秦红增:《参与式社会评估:在倾听中求得决策》,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致力于项目评估与实施的同时,也对参与式发展理论的中国化进行了探讨,如注重“新型农民”的培育,增强农民的组织性,充分利用民族文化资源优势,等等。

三是探讨了村域经济的转型与发展之路。王景新构建了村域经济转型研究框架——以村域经济制度转型、村域市场主体及其生产经营方式转型、村域经济类型分极化发展为核心,同时关注研究区域条件和宏观环境的外部冲击与村落精英和村落文化转型的内动力的重要影响,试图把区域经济学、转型经济学、社会经济学和社会人类学的村落研究理论和方法融合在一起。^①车裕斌在对1978年以来典型村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特征、现状及未来趋势进行了系统的归纳总结,认为村落经济社会的非均衡协调发展是可行的,最终建立的是各村落协调发展社会和谐的经济格局。^②其他如王习明探讨了村落经济社会结构变迁对乡村建设的影响,认为农民对公共服务日益增强的依赖性彰显了村社公共服务建设的重要性,如此等等。^③

四是和谐乡村建设的个案调查与分析。如从科技下乡、外出务工、乡村旅游、观光农业、公司加农户、农民组织、公共产品供给等视角,对和谐乡村建设给予了具体的讨论。此类研究的文章和著作非常多,这些讨论尽管立足于单个或典型乡村,但大多涉及时下乡村改革或发展干预政策,针对性和时效性较强,在此就不一一

① 王景新:《村域经济转型研究反思》,《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② 车裕斌:《典型村落经济社会转型及发展趋势》,《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③ 王习明:《村社公共服务与乡村建设:成都平原村落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